

Hanshu
Yiwenzhi
Yanjiu
Yuanliukao

傅
荣
贤
著

《汉书·艺文志》 研究源流考

黄山书社

Hanshu
Yiwenzhi
Yanjiu
Yuanliukao



傅荣贤 著

《汉书·艺文志》 研究源流考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书·艺文志》研究源流考/傅荣贤著. —合肥:黄山书社, 2007. 1

ISBN 978 - 7 - 80707 - 519 - 6

I. 汉... II. 傅... III. ①古籍—图书目录—中国—西汉时代②汉书·艺文志—研究 IV. Z812.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06706 号

出版发行:安徽出版集团 黄山书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880×1230 1/32

印 张:16

字 数:410 千字

版 次:200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5.00 元

序

中国古典目录学,其主旨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在我国现存首部分类目录《汉书·艺文志》中已有充分展现,与发端较晚并旨在部次甲乙的形式主义的西方目录学殊途异趣。正如清人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叙例》所云:“今欲求周秦学术之源流,古昔典籍之纲纪,舍是《志》无由津逮焉。”因此,我国古代目录学,其实质是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史。清人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二十二引金榜语云:“不通《汉书·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洵为至论矣。尽管现代信息技术日新月异,人们从事研究的条件较前人有了很大变化,但要了解或研治国学,同样不能无视《汉志》的学术思想价值及示人门径的重要作用。

正因为《汉志》在国学研究中的重要性,研治者代不乏人,成果丰硕,但主要集中于《汉志》的本体研究。至于对历代《汉志》研究的学术总结,或援例名之为“《汉志》学史”,却少有人关注。傅荣贤君《〈汉书·艺文志〉研究源流考》,正是填补这一空缺的颇有分量的专著,对两千年来的《汉志》研究,穷原竟委,析为四派:谓史书注解派、目录本体派、学术考辨派及专题派,这是著者多年来关注《汉志》研究史的重要发现,令人耳目一新。相信对《汉志》及《汉志》学史的研究,均将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为人作序,本应对该书的学术价值和创新作恰如其分的评介,为读者提供较为准确的参考信息,既不负所托,又对得起读者,也就是说应该实事求是。荣贤大作的学术价值,读者诸君可以自己评判,毋须饶舌。这倒不是故意塞责,实是因曾忝列导师,不便就此多说什么,以免溢美之嫌。时下世风浇薄,文以人传的道理,更为多士所钟。荣贤要我为其新作写序,其实并非上选。自问不是什么名人,多年来

因原供职单位学科建设需要,研究领域与荣贤并不一致,尽管我心向往之的治学境界是乾嘉学者的路数,也关注古典文献学的发展,但于古典目录学抑或图书馆学并无心得。因此,由我作序,既不能为其大作增色,亦无益荣贤的学术研究。

当然,由于我了解荣贤,大致可以介绍一点情况,对于读者了解其人其学,也许多少有点帮助。荣贤自1992年发表第一篇古代目录学论文至今,已有近80篇有关目录学或图书馆学的论文见诸报刊,其中7篇发表于台湾,6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35篇发表于专业核心期刊;并于1999年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了《中国古代图书分类学研究》专著。荣贤2002年考入西南师范大学(现西南大学),攻读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硕士学位,因学业优秀及科研成果突出,提前一年毕业,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认为把《汉志》研究析为四派颇有创意,获一致好评。时隔两年,作者在原论文的基础上大加扩展,并将新的研究成果熔为一炉,杀青缮写,即呈献给读者的这部厚实的著作。在读研之前发表大量论文并出版学术专著,尤其是传统学科研究,在近年的青年学者中并不多见。昔与荣贤坐而论道,士别三日,其学问大进,今为之欢忭可知矣。

荣贤以其执著精神,反思传统目录学之不足,引起了学术界同行的关注,如北京大学别立谦《近十年来中外目录学比较研究论文综述》、王波等《1996年以来的目录学研究》、艾露《梁启超目录学思想与实践研究综述》、薛旻等《1998年以来目录学史研究综述》均有评述。显然,这是荣贤多年来勤奋自励,博学慎思,更得《汉志》阃奥而取得的佳绩。

荣贤于2005年晋升副研究员,去岁移砚黑龙江大学教席,天地为之开阔,平生抱负,百尺竿头,同道中人,有所望焉。

既蒙荣贤囑为之序,辞不获命,聊缀数语如上,离经叛道,非序之序也。

蒋宗福

2007年2月于四川大学桃林村厂庐

序

中国传统文化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重要而特殊。所谓“重要”，是指在迄今为止的任何宏观文化体系中——不论是世界“两大文化”或“三大文化”体系中，还是“四大文明古国”序列中，中国传统文化都不仅仅是其中一员，并且地位显赫，举足轻重；所谓“特殊”，是指在世界各民族文化中，只有中国传统文化真正属于“一脉相承”的文化体系，不但没有出现过空间断层，而且在各个具体领域里星汉灿烂，高峰迭起。这一珍贵宝库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准此以考之，中国传统文化之义大矣哉！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图书文献是文化的基本载体，中国传统图书文献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载体。正是通过一代代图书文献，才使我们切切实实地知道了历代先人贡献于各个领域中的劳动和智慧的结晶：譬如中国古代文学领域中的先秦诗歌，诸子散文，汉赋，魏晋诗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譬如中国古代哲学领域中的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实学——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假如我国古代根本就没有图书文献这一伟大宝库，假如历史上虽曾拥有这一伟大宝库，却未能得到保存或未能通过一定形式反映出来，真不知由一代代前人积累的知识和智慧如何自处，如何继续闪光？准此以考之，图书文献之义大矣哉！

汉以前三千年历史，是华夏文化萌芽、发展和奠基的重要时期。能够比较全面、系统揭示这一时期文化现象者，非同一时期之传统文献莫属；能够比较全面、系统且最早揭示这一时期传统文献概况者，非汉代大学者刘歆之《七略》莫属；而能够比较全面、系统揭示刘歆《七略》亡佚前该志之原貌者，则非《汉书·艺文志》莫属。《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目录学发展史上第一部史志目录，也是我国乃至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考察中国目录学发展史乃至整个学术发展

史,《汉书·艺文志》都具有极其特殊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设若没有《汉书·艺文志》,固然难详三千年来传统文献的类别与规模,而更有甚者,由此也就必然难详三千年来传统文化演进的路程和轨迹。譬如,足球之源于中国,唯有《汉志》及后人相应注释中保存了原始而系统的资料;又如作为后世一大文体的“小说”,何以从当初诸子百家之“小说家”发展、演变而来?唯有《汉志》中才依稀可踪其轨迹和答案。无怪乎清代学界诸大家敢于次第放出重话:“不通《汉书·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欲求周秦学术之源流,古昔典籍之纲纪,舍是《志》无由津逮。”准此以考之,《汉书·艺文志》之义大矣哉!

《汉书·艺文志》作为古代史志目录开创之作,其学术价值之大,当不在《说文》、《诗经》诸经典之下。惟其如此,在此《志》问世之后的二千年间,注释者、增补者、研究者,可谓前赴后继,代不乏人,成果累累,清代尤甚。然而,在《说文研究史》、《诗经研究史》等著作一出再出之后,对《汉书·艺文志》一路走来之专门历史研究,迄今犹付诸阙如。有见于此,傅荣贤针对以往《汉志》研究的主要成果进行了系统探讨,对于历史上《汉志》研究发生、发展之来龙去脉,认真梳理,逐一剖析,明示体例,议论得失,在此基础上总结出相应规律。这部《〈汉书·艺文志〉研究源流考》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为一般概述性质。第二章到第五章乃是全书主体部分,其基本布局是一章一派,分层梳理。作者认为二千年的《汉志》研究,迹其流品,约有四变,亦作四派:一是在对《汉书》的注解中涉及到《汉志》,形成史书注解派;二是专注于《汉志》的目录学特征,斯为目录本体派;三是立足于《汉志》的文化价值,出现了学术考辨派;四是对《汉志》本身的专题研究,遂有专题派。四派为例各殊,互有出入,虽然如此,却各有其深刻见地。而从总体上看,历代《汉志》研究发展演变的轨迹,则经历了从音义训诂到分析学术源流,从考据校雠到探勘目录本体特征,从局部思考到整体把握的理性化演进的路程。以上几章将二千年的研究成果从四大派别上加以归纳,超越了一般学术史著作单纯以历史时序

为行文脉络的机械图式。本书第六章则“从《汉志》研究透视整个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在对历代《汉志》成果作疏理的基础上，揭示整个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的特点和不足，从而揭示出中国古代先贤在对《汉志》具体书目的分析中所形成的不同于西方的目录学反思焦点。

“古为今用”乃是我们一贯的文化方针。本书研究对象虽属古代范畴，但决非为古而古，立意则是服务现实、服务社会，具有显然的重要意义。众所周知，当今世界文化的主流仍然是西方文化，与此相应的西方形式主义的目录也取得了独步中西的地位。但是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从根本上说，符合人类整体与长远利益的基本走向。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自具特色、具有悠久历史的伟大文化，它的一些基本内容和特征既积淀于古代目录中，又通过这种独特的书目系统释放出来。从一定意义上说，不懂得中国古代书目系统的建构秘密，就不能真正懂得中国传统文化。由于本书的问世，人们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汉志》，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古代两千多年图书目录的一般特点，还可以深入了解书目背后所积淀的文化现象及其本质。

学界有一句老话：“板凳坐得十年冷，文章不做一字空。”这是对真正的学者或大学者不为外界喧嚣和利诱所动，能够一如既往执著于学术研究活动的最高褒奖。我不能说也不敢说，本书作者的成果，句句出彩，字字珠玑，“文章不做一字空”。但是，作者“板凳坐得十年冷”的功夫却是有的。单就此句而言，其义有二：一是方向冷僻。相对于许多人热衷于现代的、当代的乃至未来的热门题目的研究，本书作者把古代的图书与目录确定为自己的主攻方向（或曰主攻方向之一），敢于进入时下许多人不愿顾及而实属重要的一个领域，令人钦佩；二是有韧性。作者不为市场经济时代形势大潮所动，心甘情愿地进行古代文化领域研究，而且长期坚持，一如既往，无改初衷，令人赞叹。说起我与作者的直接交往，并不很久。2004年10月，在南开大学举办的中国目录学全国第四届大会上，我第一次认识了傅荣贤。谋面虽是首次，却有一见如故感觉。因读其作而闻其名，进而渐知其

人之过程,堪称由来已久。在此多年以前,他的文章就已经引起我的关注,我曾先后多次与学界诸友道及其人学问。他的研究建立于一定的文化功底之上,因而大都洋洋洒洒,不落俗套。两年前读其大作《中国古代图书分类学研究》(台湾学生书局1999年印行),至今尚留印象:他不仅于该书中提出“中国古代图书分类学”概念,首度构建起相应之理论体系,还在分类系统与文化系统相互融通的思想指导下,将中国古代图书分类置于整个传统文化大背景下,逐一审视并得出结论。

通常阅读傅荣贤的论著,一般会有这样感觉:历史视野开阔,屡有深层挖掘,于大中可见小,于小中可见大,理念新颖,文字古雅,耐人咀嚼,余味隽永。傅氏这部新作,在以往研究基础上冶于一炉,不止亦复如是,可谓“青出于蓝”。

适值《〈汉书·艺文志〉研究源流考》即将由黄山书社出版之际,笔者由衷高兴并表示祝贺!凭着以往对作者的了解以及对本书书稿的初步浏览,我相信该书问世之后,人们一定会从中获益匪浅。

是为序。

王锦贵

丁亥年立春五日于北京大学燕北园

目 录

序	蒋宗福 1
---------	-------

序	王锦贵 1
---------	-------

第一章 绪 论	1
---------------	---

第一节 《汉志》概要	2
------------------	---

第二节 为什么要考历代《汉志》研究的源流	18
----------------------------	----

第三节 历代《汉志》研究流派概览	23
------------------------	----

第二章 历代史书注解派的《汉志》研究	32
--------------------------	----

第一节 历代史书注解派《汉志》研究概述	33
---------------------------	----

第二节 颜师古之前的《汉书》注本	36
------------------------	----

第三节 颜师古《汉书注》中的《汉志》研究	39
----------------------------	----

第四节 吴仁杰《两汉刊误补遗》中的《汉志》研究	47
-------------------------------	----

第五节 佚名《汉书考证》中的《汉志》研究	51
----------------------------	----

第六节 佚名《汉书疏证》中的《汉志》研究	54
----------------------------	----

第七节 凌稚隆《汉书评林》中的《汉志》研究	59
-----------------------------	----

第八节 杭世骏《汉书蒙拾》和王念孙《读汉书杂志》中的 《汉志》研究	64
--	----

第九节 齐召南《汉书考证》中的《汉志》研究	67
-----------------------------	----

第十节 钱大昭《汉书辨疑》中的《汉志》研究	71
-----------------------------	----

第十一节 沈钦韩《汉书疏证》中的《汉志》研究	75
------------------------------	----

第十二节	周寿昌《汉书注校补》中的《汉志》研究	82
第十三节	朱一新《汉书管见》中的《汉志》研究	88
第十四节	王先谦《汉书补注》中的《汉志》研究	91
第十五节	沈家本《汉书琐言》中的《汉志》研究	101
第十六节	杨树达《汉书窥管》中的《汉志》研究	104
第十七节	陈直《汉书新证》中的《汉志》研究	110
第十八节	对史书注解派《汉志》研究的总结	115

第三章 历代目录本体派的《汉志》研究

126

第一节	历代目录本体派《汉志》研究概述	126
第二节	阮孝绪的《汉志》研究	133
第三节	郑樵的《汉志》研究	137
第四节	《隋书·经籍志》等三部书目的《汉志》观	145
第五节	清代《四库总目》的《汉志》研究	151
第六节	传统目录本体派《汉志》研究之总结	158
第七节	近代目录本体派《汉志》研究简述	165
第八节	杜定友的《汉志》研究	173
第九节	余嘉锡的《汉志》研究	180
第十节	刘纪泽的《汉志》研究	191
第十一节	刘咸炘的《汉志》研究	195
第十二节	姚名达的《汉志》研究	204
第十三节	近代目录本体派《汉志》研究之总结	211
第十四节	现代目录本体派《汉志》研究概览	214
第十五节	王重民的《汉志》研究	217
第十六节	吕绍虞的《汉志》研究	221
第十七节	来新夏等四部目录学史著的《汉志》研究	227
第十八节	两部台湾著作中的《汉志》研究	238

第十九节 现代目录本体派《汉志》研究之总结	242
-----------------------------	-----

第四章 历代学术考辨派的《汉志》研究

第一节 历代学术考辨派《汉志》研究概述	256
第二节 《汉志》在辨伪中的价值	261
第三节 胡应麟的《汉志》研究	268
第四节 康有为的《汉志》研究	277
第五节 历代学者利用《汉志》考订文史概览	282
第六节 王鸣盛的《汉志》研究	285
第七节 章太炎的《汉志》研究	291
第八节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汉志》研究中的文史考 订	295
第九节 《汉志》“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本质	299
第十节 章学诚的《汉志》研究	306
第十一节 对学术考辨派《汉志》研究之总结	322

第五章 历代专题派的《汉志》研究

第一节 历代专题派《汉志》研究概述	333
第二节 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	338
第三节 散见古人文集中的《汉志》专题研究	349
第四节 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和《汉书艺文志条理》	360
第五节 刘光蕘《前汉书艺文志注》	373
第六节 孙德谦的《汉志》研究	379
第七节 梁启超的《汉志》研究	387
第八节 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	397
第九节 程千帆的《汉志》专题研究	406
第十节 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释例》和《汉书艺文志通释》	414

第十一节	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	425
第十二节	徐文助《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与兵书略通考》·····	430
第十三节	现代《汉志》专题研究概览·····	436
第十四节	历代专题派《汉志》研究总结·····	450

第六章 从《汉志》研究透视整个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

·····	466
第一节 学科名称 ·····	467
第二节 研究对象 ·····	469
第三节 研究内容 ·····	475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478
第五节 研究目的 ·····	485
余 论 ·····	490
主要参考文献 ·····	492
后 记 ·····	497

第一章 绪 论

《汉书·艺文志》(以下省称《汉志》)是东汉史学家班固(32—92)所著断代体史书《汉书》100卷之一,它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成熟书目分类系统,在目录学和传统学术文化上具有重要地位。目录和文化上的双重价值,使得《汉志》长期吸引着学者的注意,对它的研究绵延二千载,世代不废,出现了数量非常庞大的研究成果。为此,有必要对前人研究成果加以适时总结,以期得出带有规律性的认识。然而,前贤时修对《汉志》的研究固然十分重视,但对于《汉志》研究的研究,亦即对历史上的《汉志》研究之发生、发展的来龙去脉的分析则较为贫乏。虽然在《汉志》研究的过程中,学者们往往伴随有对《汉志》研究史的简评,如梁启超《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开头就有《汉志》研究史的简述;姚名达《中国古代目录学·史志篇》“汉志”条下也有《汉志》研究史的简单回顾等等,但它们都多则数百言、少则数十言即告藏事,谈不上全面和深刻的总结。此外,倪晓健1981年在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的硕士学位论文《班固汉书艺文志研究》(彭斐章、谢灼华指导)分四个部分:一、《汉志》的产生;二、《汉志》内容剖析;三、《汉志》研究综述;四、《汉志》的影响及价值^[1]。其中第三部分“《汉志》研究综述”涉及到对《汉志》研究史的专论。而以笔者所见,真正专事总结《汉志》研究的,迄今为止只有谌三元的一篇数千字的论文^[2]。

总之,我国《汉志》研究的历史源远流长,而对于有关《汉志》研究的研究虽然也被提及,但却尚未出现真正系统的著述,这和《汉志》的重大学术地位,以及历代蜂出并作的《汉志》研究成果显然是不适应的。对古往今来《汉志》研究的一些主要成果作再研究,分层梳理、

交代体例、议论得失、总结规律,无疑有助于我们今人在甄采前人的基础上,对《汉志》作出例有加密的进一步研究,从而最大限度地释放《汉志》目录和文化上的巨大能量。

第一节 《汉志》概要

一、《汉志》和《别录》、《七略》之间的承传流变关系

(一)《汉志》的成书

《汉志·总序》云:“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

可见,《汉志》是以刘歆(?—23)《七略》为蓝本,而《七略》又是绍绪刘向(公元前79—公元前7)“条其篇目,撮其指意”的《别录》而成篇。萧梁之际的目录学家阮孝绪(479—536)《七录·序》云:“昔刘向校书,辄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随竟奏上,皆载在本书。时又别集众录,谓之别录,即今之《别录》是也。”^[3]亦即《别录》是将刘向当时“皆载在本书”的一篇篇叙录提要,单独辑录而出所得,《隋书·经籍志》(以下省称《隋志》)等著录为二十卷。“会向卒”,刘歆继业二载,在乃父《别录》的基础上完成了中国历史上首部体系完备的书目分类之作《七略》。《汉书·楚元王传》亦云:“(歆)复领《五经》,卒父前业。歆乃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七略》正是在二

十卷《别录》的基础上删削而成的书目著作,《隋志》等著录为七卷。这里,录、略对言,当有详略之分。《公羊传·隐公十年》:“《春秋》录内而略外。”《庄公十七年》:“将其有末,不得不录其本也。”可见,录详于略。《七略》之于《别录》,有似清代《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之于《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四库总目》)。

《别录》系由一篇篇叙录组成,仅涉及到篇目,即每一书的目录,这和此前的《易经·序卦》、《吕氏春秋·序意》、《淮南子·要略》、《史记·太史公自序》等文篇性质相似。而旨在“种别”的《七略》则既编了目又分了类,形成了类似今天的书名目录和分类目录。它站在当时文献整体的高度,从《别录》之集一书目录,推阐为众理群书目录,以期“部次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氏之学,使之绳贯珠联,无少缺逸,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4]。也就是要从文化总体系的意义关联上将当时见存的数百种文献构成一个彼此相连、密不可分的宏观体系。《七略》中的《辑略》,依阮孝绪之说,为“六篇之总最”,是总论性的提要。所以,“七略”其名为“七”,实分六“略”。《说文·田部》云:“略,经略土地也。从田各声。”略本义为田界,引申为类别。郑樵《通志·氏族略序》亦云:“略者,举其大纲。”章太炎《征七略》云:“略者,封畛之正名。《传》曰:‘天子经略。’所以标别群书之际,其名实砒然。”^[5]六略,即是指六个大的类别。六大类之下,又各分小类。其中《六艺略》分九小类、《诸子略》分十小类、《诗赋略》分五小类、《兵书略》分四小类、《数术略》分六小类、《方技略》分四小类,总计三十八小类,是为二级图书分类体系。

和《别录》相比,《七略》以“种别”为职志,但举学术纲领,不复详于一书。这就超越了一本本单个文献的具体性,立足于宏观文化体系,思考的空间更为深广,因而更为学者所称道。范文澜评价《七略》说:“它不只是目录学、校勘学的开端,更重要地还在于它是一部极珍贵的古代文化史。西汉有《史记》、《七略》两大著作,在史学史上是辉煌的成就。”^[6]为什么《七略》本自《别录》且篇卷仅及其三分之一,但学者更垂青于《七略》呢?这显然和《七略》的文化视野更为开阔

有关。由这种大视野引领,《七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目录编制原则和方法,反映了当时学术思想和科学技术的体系与流派,直接导致了《汉志》的产生。

和西方目录相比,若以《汉书》成书的公元82年计,《汉志》比西方最早的“目录学之父”盖士纳(Conrad Gesner)作于1545年的《国际书目》(Bibliotheca Universalis)分类体系要早1460多年。而如果以《七略》成书的公元前6年计,则要早其1550多年。作者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今陕西省咸阳市东),世家出身。曾以中护军职随窦宪出击匈奴。东汉明帝永平间(58—75)任校书郎,所著《汉书》开后世断代修史之法。班固还是东汉著名的古文经学家,他据白虎观会议所撰之《白虎通论》,为经学史上的重要著作。《后汉书》有传。

阮孝绪《七录·序》说:“及后汉兰台,犹(以《七略》)为书部。”兰台是东汉的皇家图书馆,兰台之外,东汉另有东观、仁寿阁两大新馆,班固曾典掌其事。《隋志·序》云:“王莽之末,又被焚烧。光武中兴,笃好文雅,明、章继轨,尤重经术。四方鸿生巨儒,负帙自远而至者,不可胜算。石室、兰台,弥以充积。又于东观及仁寿阁集新书,校书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并依《七略》而为书部。固又编之,以为《汉书·艺文志》。”因班氏有具体校书实践,故其对典籍价值认识尤深。这是班固以刘歆《七略》为蓝本,“删其要,以备篇籍”,在《七略》七卷的基础上删削为一卷《汉志》,作为《汉书》一百卷之一的重要原因。“志”是《汉书》中的一种体裁,是承袭《史记》中的“书”体而来。《汉书》中共有十志,《艺文志》是其中之一,“艺文志”的名称也是由班氏首创的。事实上,班氏节《七略》为《汉书》十志之一,这本身就是班氏的贡献。唐代史学家刘知几(661—721)《史通·题目》云:“子长《史记》别创八书,孟坚既以汉为书,不可更标‘书’号,改书为志,义在互文。”诚然,如果班固不改《史记》中的“书”体,那么《汉书·艺文志》就叫《汉书·艺文书》;《汉书·地理志》也叫《汉书·地理书》,其中的命名混乱是显而易见的。

《七略》和《汉志》的这种传承关系,使得刘、班异同一直是学术